

六十年来中国的土耳其研究

咎 涛

内容提要 60年来中国学界对土耳其作了一些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这段时期。从改革开放初期重新评价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地位,到总结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经验,进而到研究军人干政、库尔德问题、伊斯兰复兴,以及中土关系等重要问题,中国的土耳其研究取得了不小进步。但整体上仍很薄弱,资料缺乏,译介迟滞,原创性不足。

关键词 土耳其 中国 研究 凯末尔

作者简介 咎涛,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北京 100871)。

改革开放前 中国对土耳其的认知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在整体上,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受到冷战格局,以及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长期仿照苏联的研究模式,在关注的内容、视野和研究水平方面都有很大不足。这也影响到对土耳其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对土耳其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另外,对土耳其研究的忽视,也是因为冷战背景下两国关系疏远,以及土耳其的影响力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国人就对土耳其完全不关注。

改革开放前,国人对土耳其的认识和研究受到僵化意识形态与复杂现实政治的双重影响。

首先,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对“凯末尔主义”(当时译为“基马尔主义”)进行了批判。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对此又有专论,并指出:“……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

从现实政治角度看,在1971年建交之前,中土关系基本上处于敌对状态,其中,朝鲜战争

是一个重要因素。朝鲜战争中,作为美国盟友,土耳其部队是美国主导的所谓“联合国军”的主力之一。在战场上,土耳其士兵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激烈交战。这场战争在两个民族的心理上都留下了负面影响。从中国方面来说,土耳其一直被视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门德列斯政府时期,中国不断谴责土耳其的政治路线。¹

在上述情况下,凯末尔领导建立的土耳其就被视为帝国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在以革命和反革命划界的时代,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自然就成了反革命的一方。冷战期间,意识形态的斗争对各国都影响很大,这深刻地影响到当时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20世纪60年代,中国曾公开声明支持土耳其的左派运动,《人民日报》也在其社论中表示支持土耳其人民。^④

翻译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学者翻译了一些与土耳其有关的苏联学者的论著。其中最重要的要属安·菲·米列尔的《土耳其现代简明史》^④。该书论述20世纪上半叶的土耳其历史,资料翔实丰富,是当时国内不可多得

¹ 参见《人民日报》1960年5月10日。

^④ 参见《人民日报》1960年5月5日。

^④ 参见[苏联]安·菲·米列尔著;朱贵生等译:《土耳其现代简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1958年第一版)。

的研究和了解土耳其历史的重要著作。此外,60年代的《亚非译丛》也收入了一些苏联学者关于土耳其的研究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亚非译丛》于1960年第5期出版了“土耳其专辑”。

综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受到当时意识形态导向的极大影响,对土耳其研究是以译介苏联学者的作品为主。

三十年来 中国的土耳其研究概览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学界的土耳其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集中表现为研究范围扩大、研究水平提高和研究论著显著增加,^①以及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30年来,在我国的土耳其史研究中做出了奠基性工作的是杨兆钧、彭树智和朱克柔等。之后,一些中青年学者对土耳其现代史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如肖宪、孙振玉、董正华、黄维民、刘云、陈德成、毕健康等。

(一) 重新认识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

30年来,我国对土耳其的学术研究是以扭转过去意识形态的误导为基础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何芳川、林被甸两位教授的相关论文为重新评价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用作了整体论述。^②具体对土耳其的研究来说,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并至今仍在国内学界处于一流水平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朱克柔先生。他首先是对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这从他早期发表的两篇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历史作用》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3期)、《凯末尔对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贡献》载《世界历史》(1981年第2期)。

(二) 重视土耳其现代化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逐渐兴起,有关土耳其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在现代化范式主导下进行的。董正华认为:“土耳其走向现代国家之路,是一条比较典型的不断改革之路。”^③此外,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彭树智先生,以及黄维民和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刘云所做的工作,^④云南大学肖宪教授等对凯末尔改革的研究,^⑤等等,这些较新研究成果都不脱“现代化范式”的基本构架。

还有学者对土耳其的世俗化问题非常关注,所著论文也不少,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只有孙振玉和朱克柔两位。专门研究土耳其宗教问题的是孙振玉先生,他探讨了土耳其的世俗化进程,并着重考察了土耳其宗教派别与伊斯兰复兴的现状。^⑥朱克柔先生的两篇论文分别探讨了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和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问题,其中运用了很多土耳其文献。^⑦

(三) 关注土耳其的对外关系

在土耳其外交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国内最为重要的专著是肖宪等撰写的《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另外,朱克柔先生也曾对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的对外政策有一专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⑧另外,在对中土关系研究方面,也出现了几篇颇值得重视的论文。其分别是:张铁伟:《中国和土耳其友好关系小史》载《西亚非洲》1987年第6期;黄维民:《中土关系的历史考察及评析》载《西亚非洲》2003年第5期;肖宪、王文章:《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演变、问题与未来》载《外交评论》,2007年4月。这几篇文章对于了解中土关系都具有重要价值。

^① 《亚非译丛》是由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筹备处主办、《亚非译丛》筹委会编辑出版。

^② 笔者最近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了《西亚非洲》创刊近30年来有关土耳其的研究作品,其中题目里含有“土耳其”的共72篇,除去综述和简介类的小文章,研究性论文不少于60篇。关注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与宗教各个方面。

^③ 林被甸:《正确评价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在现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0期;何芳川:《论近代亚州资产阶级早期政治活动的性质和作用》载《世界历史》,1984年第6期。林被甸:《现代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载《世界历史》,1985年第3期。

^④ 董正华:《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点——以凯末尔改革为重点》,载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

^⑤ 彭树智主编;黄维民著:《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刘云著:《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⑥ 肖宪等著:《沉痾猛药——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⑦ 孙振玉著:《传统与现实——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⑧ 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⑨ 朱克柔:《论土耳其三十年代的对外政策》,载《世界历史》,1985年第4期。

(四) 其他专题

除了前述重要专题研究, 以及少量通论性著作¹以外, 国内学者还关注下列专题: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土耳其的民主化、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 以及土耳其的文武关系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土耳其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 基本上也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关于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论文, 此处不赘。

(五) 译著渐增

1982年, 范中廉翻译了英国学者伯纳德·刘易斯著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该书的翻译出版曾经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的土耳其研究, 据笔者所见, 该书的引用率是最高的。香港学者陈方正先生曾在其主编的《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中收入了两本有关土耳其历史的重要译作。^④美国著名土耳其研究专家斯坦福·肖的《奥斯曼帝国》也于近年被译成了中文(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评述与展望

国内学界土耳其研究面临的若干问题如下:

1. 资料问题。国内学者所使用的资料普遍原始性不足。很少有学者能看懂土耳其学者用土耳其语撰写的作品, 很少能用该语言从事研究。

2. 理论问题。如果说以前的学术研究是紧跟苏联, 现在则受到英、美的较大影响(这大概也与不能使用土耳其语文献有关)。需要指出, 尽管苏联学者的研究意识形态化色彩浓厚, 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社科研究的一种成熟范式, 它的研究视角仍值得重视, 比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土耳其与苏联的关系、土耳其国内底层的阶级状况, 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性分析等课题。

3. 与国际学界交流少, 了解也比较少。在1979年出版的第一期《世界史研究动态》中, 朱克柔先生发表了《美国研究土耳其史概况》一文, 此文介绍的是当时西方学界对土耳其历史研究最前沿的成果, 并明确提到, “重视掌握利用土耳其第一手资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土耳其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的重要原因。这样的

学术史整理在今天显得尤为迫切, 只有做好这一块, 才能避免过多的低水平重复。

4. 翻译工作落后。在国内研究水平偏低的情况下, 实际上亟需翻译一些较新的研究著作。前文曾提到一些译著, 但基本上都是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 显然无法满足国人了解土耳其的需求。

5. 人文研究薄弱。在土耳其研究方面, 人文学科研究尤其需要进一步提高, 包括历史学、文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等等。人文研究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 才能生产出真正的具有中国视角的知识。

从总体来看, 我国的土耳其研究仍很薄弱, 没有建立在对土耳其和西方学界的广泛了解基础上, 而主要还是根据英文的二手研究资料完成的。

最后, 笔者认为, 作好中国的土耳其研究, 需要继承和发扬两个传统: (1) 民国知识分子的现实感和中国立场, 即自康、梁以降经革命党人至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对土耳其的关注, 主要是从中国现实问题出发去研究土耳其的如下问题——奥斯曼帝国的改良、青年土耳其革命、土耳其的独立运动和凯末尔领导的现代化改革等^②; (2) 改革开放初期前辈学者的严谨治学态度, 比如, 杨兆钧先生利用土耳其文资料撰写了《土耳其现代史》而朱克柔先生能够熟练运用土耳其语、俄语和英文资料进行研究, 这都值得后辈学习。

(责任编辑: 徐拓 责任校对: 成红)

¹ 杨兆钧教授撰写的《土耳其现代史》, 较深入地评述了土耳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发展状况, 是国内研究土耳其现代历史的重要专著, 也是国内唯一一部根据土耳其文资料撰写的通史性论著。彭树智主编; 黄维民著的《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也属于通论性国别史作品。

^④ 这两本书分别是: 伊兹科维兹著; 韦德培译: 《帝国的剖析》戴维森著; 张增健、刘同舜译: 《从瓦解到新生: 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都是由上海学林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

^② See Dong Zhenghua “Chinese Views of Atatürk and Modern Turkey”, Ankara Üniversitesi Siyasal Bilgiler Fakültesi (安卡拉大学政治学系) 编: *Uluslararası Konferans Atatürk Ve Modern Türkiye* (《“阿塔图尔克与现代土耳其”国际会议论文集》), Ankara Üniversitesi Basımevi 1999 pp. 669–675.